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

冯立军

摘要：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中医药交流始于秦汉时期，结束于清朝前期。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分别阐述秦汉魏晋、隋唐宋元以及明清三个阶段双方交流的方式及特点，最后论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中医药交流给双方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东南亚； 中医药； 交流

中图分类号：D8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 (2002) 03-0008-12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封闭的自我繁殖，而总是要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互相影响、补充、渗透，不断借鉴、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交流对于各国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也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理解和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医药作为中华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中国先进的医药技术不断传播到周边国家，诸如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对这些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国家在接纳中医药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宝库，表现为相互间药物种类的交流，新医方的增加和医药书籍的撰写。这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史载：“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与越人战”。[1]而后随着中原王朝势力不断向南发展，中原人士的南迁，以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为起点，经都元国（今越南南圻），邑卢没国（今泰国的华富里(Lophburi)），諶离国（在暹罗湾头的佛统），夫甘都卢国（即缅甸的蒲甘(Pagan)），最后到达黄支国（即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Conjeeveram)），并经己程不国（即今之锡兰岛(Sihadipa)），皮宗（指苏门答腊岛），至日南象郡为回程的

收稿日期：2002 - 06 - 12

作者简介：冯立军（1970 - ），男，满族，河北宽城县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南海航线 [2] 的开辟, 促进了中医药的对外传播, 同时也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据史籍所载, 汉灵帝崩后, “天下扰乱, 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 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 时人多有学者。” [3] 三国时期, 名医董奉游交趾, 曾使士燮 “死” 而复生。 [4] 又据越南史书记载: 在公元 257 年, 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病, 并著有《公余集记》行世。 [5] 晋朝名医葛洪曾向人表示要到交趾去炼丹药, 则反映出交趾地区的医药在内地的影响下亦已经得到提高。 [6] 南齐时, 阴铿之妻在交州, 因受地气卑湿而患上腹胀一症, 无法治疗, 后遇 “苍梧道士” 林胜到该地采药, 遂以 “温白丸” 治疗而愈。 [7]

在中医药传入东南亚的同时, 其地的奇香异药也传入中国。东汉初年, 马援南征交趾, “常饵薏苡实, 以胜瘴气”。及至军还, “载之一车”, 以 “南方薏苡实大, 欲以为种”。 [8] 到南北朝时, 薏苡在中国内地已经广泛种植, 且成为治疗小儿蛔虫的特效药。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记载说: “薏苡处处有, 多生人家, 交趾者子最大, 实重累者为良, 用之取中仁, 今小儿病蚘虫 (蛔虫), 取根煮汁, 糜食之甚香, 而去蚘虫大效”。 [9] 三国初期, 张津在交趾作刺使, 曾把越南产的益智仁送给曹操。 [10] 据《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所载说: “燮每遣使诣权, 致杂香细葛, 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 无岁不至。” [11] 又卷五十三薛综传提道: “(交州) 田户之租赋, 裁取供办, 贵致远珍、香药、象牙、犀角等奇物, 充备宝玩, 不必仰其赋入, 以益中国。” [12] 《齐民要术》引《南中八郡志》说: “交趾特出好桔, 大且甘, 而不可多啖, 令人下痢。” 书中还提出诸如扶留藤、桶子、槟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药用。 [13] 《梁书·扶南传》称越南产沉香、郁金、苏合香等, 又陶宏景的《名医别录》说越南产水苏和石硫磺。所载的这些药物都由越南输入我国。

除越南外, 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向中国输入药物。如干陀利国,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万丹港, 在公元 455 年 (我国南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 502 年 (梁武帝天监元年), 518 年 (天监十七年), 520 年 (普通元年), 563 年 (陈文帝天嘉四年), 共 5 次派使者到建康访问, 馈赠杂香药等珍贵礼物。婆利国,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其国王于公元 473 年 (宋后废帝元徽元年), 517 年 (梁武帝天监十六年), 522 年 (普通三年) 也遣使到建康, 馈赠杂香药等数十种礼物。丹丹国, 在今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吉兰丹。其国王分别于公元 531 年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5 年 (大同元年)、571 年 (陈宣帝太康元年)、581 年 (太建元年)、584 年 (后主至德二年), 派遣使者到建康供奉香药等。槃槃国, 在今加里曼丹北部沙捞越或沙巴和文莱的境内。公元 529 年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32 年 (大通四年)、534 年 (大通六年), 槃槃国王遣使来建康, 进贡沉香、檀香、詹糖等香药数十种。 [14]

这一阶段是双方医药交流的初始期, 中国先进的中医药随着医药人士传播到东南亚国家, 并逐渐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可。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药材也开始向中国输入。

二、隋唐五代宋元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

(一)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很发达,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海上交通比秦汉时期也发达得多,隋唐统治者又实行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发展很快。

安南,在今越南境内。根据史籍所载,隋唐时期,中国许多名人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学也随之更多地传入越南。据《历代名医蒙求》卷下引玉堂闲话所记,唐代中国人申光逊曾用胡椒、干姜等辛辣药物治好了安南人孙仲敖的脑病。[15]唐开元年间,封建中央政府为了发展安南与内地的贸易,曾专门委派市舶使至安南。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越医药贸易交往,各地商人远途贩运药、茶等百货至安南,又从安南贩运犀、象、玳瑁、珠玑等土产到内地。正如史籍所云:“安南溪洞,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16]此外,中国的《内经》、《脉经》等医书也于此时传入安南。[17]甚至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也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18]

由于海陆交通日益发达,因而越南输入内地的药物逐渐增多。据苏敬《新修本草》和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载,当时从越南运入的药物有白老藤、庵摩勒、丁香、詹糖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桐木等,另据《太平广记》卷405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羔,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说明当时越南制的中成药也传入了中国。[19]

诃陵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据《唐会要》的记载,其国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玳瑁盖、生犀等。[20]又《本草纲目》中记载,该国人曾向我国传授药方。其中说道:“唐郑相国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其病状,遂传方并药”。郑相国服后,觉其功效。等到元和十年二月罢郡归京,乃录方传之。“用破故纸十两,净择去皮,洗过曝,捣节令细,胡桃瓢二十两,汤浸去皮,细研如泥,更以好蜜合,令如饴糖,瓷器盛之,旦日以煖酒二合调药一匙,服之,便以饭压。如不饮酒人,以暖热水调之,弥久则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添筋骨,但禁芸苔羊血,余无所忌。”又说“此物本自外番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番人呼为补骨脂,语讹为破故纸也”。[21]

真腊国,即今柬埔寨,亦出好药。唐显庆元年,僧人那素提曾被敕往其国采取异药[22]。

墮婆登国,在诃陵国之西,当亦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旧唐书卷197》载:“贞观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等。”[23]

大量香药的输入,引起了一些医家的注意。五代时人李珣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著有《海药本草》一书,该书收录来自东南亚、西亚的香药很多,如丁香、乳香、茅香、迷迭香、降真香、甘松香、安息香、蜜香等。《海药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外来药的专著,也是唐末五代南方出产药物的总结,它反映了我国唐代与东南亚、西亚以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医药文化交流。

（二）宋元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

宋元时代，我国对外贸易非常发达，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非常频繁，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医药的交流不断发展。当时，与中国进行香药贸易往来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交趾、占城、安南、真腊、阇婆、苏吉丹、三佛齐、丹眉流、罗斛、渤泥、蒲甘等国。下面分述之：

1、交趾、占城、安南

此三国相当于现在的越南一带，据《宋史》所作的统计，宋代交趾向中国朝贡达数十次。交趾贡使所携带的贡品种类繁多，主要的有香料、药材、珍珠、玳瑁、犀、象、象牙等。又据有关史料所载，有宋一代，位于越南中部的古国占城向宋朝廷派遣朝贡使团达40多次。[24]贡物主要是象牙、犀角、玳瑁、龙脑、沉香、胡椒、槟榔、檀香、豆蔻、茴香等药材。《四明志·市舶》记载南宋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年）输入的药物有：麝香、沉香、龙涎香、胡椒、槟榔、萆澄茄、萆拔、良姜、益智子、缩砂、蓬莪术、海桐皮、桂皮、大腹皮、丁香皮、姜黄、木鳖子、茱萸、相思子、大风油、苏木等。[25]

元代，越南继续同中国封建王朝保持藩属关系，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规定：自中统四年始，每三年一贡。仍以訥刺丁充达鲁花赤，佩虎符，往来安南国中。[26]根据廖大珂老师的统计，有元一代，越南共向元朝进贡52次之多，其中安南36次，占城16次。[27]香药类贡品主要有苏合油、光香、朱砂、沉香、檀香、犀角、和象牙等。[28]对于这些香药类贡品，元朝政府要求很高，需要品味俱佳。如元至元七年（1270），中书省以越南“所贡药物品味未佳”，加以责怪。[29]

元代，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回赐越南贡使药物之事。如世祖中统四年（1263），“帝赐来使玉带、缙帛、药饵、鞍辔有差”。至元四年（1267），“赐光昺玉带、金缙、药饵、鞍辔等物”。至元六年（1269），（越南）“又具表纳贡，别奉表谢赐西锦、帛、药物”。[30]

此外，中越民间的中医药交流也很频繁。在中越边境地区，“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中有“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的边民，谓之“交趾蟹”，也有富商博易者，叫作“小纲”，还有越南派遣的使臣来进行交易的，称为“大纲”。这些富商和使臣所带的货物常为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等，交换的中国货为药材、丝绸、纸笔等。[31]越南还常常派人到中国购买药材。如清陆以恬《冷庐医话》卷五引钱塘县志称，南宋时越南人来临安（今杭州）大量购买土茯苓，造成了这味药的涨价。[32]《大越史记全书》记有元代医生邹庚用针灸术治好了越南皇子皤的病。[33]而越南医生黎德全也曾为宋后治病，名闻南宋。[34]

2、真腊

真腊为今柬埔寨之古称。据《诸蕃志》所载，宋代中国商人常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醢醢之属交换当地的象牙、暂速细香、粗熟香、黄蜡、翠毛、笃耨脑、笃耨瓢、香油、姜皮、金颜香、苏木等物。[35]元代该国输入的药物主要有黄蜡、犀角、沉香、苏木、大枫子[36]、降真香、豆蔻、紫梗、大枫子油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欲得唐货”中记述了中国的麝香、檀香、草苧、白芷、焰硝、硫磺、水银、银珠、桐油等深受真腊人欢迎和喜爱。书中还记载了真腊人的医药卫生风俗，如“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真腊）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

可”。其国人“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间”，“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之药不类，不知其为何物。”[37]从真腊国当时癩病（相当于麻风病）流行和对大枫子的药用推测，真腊人已积累了防治麻风病的经验。

3、阁婆、苏吉丹

阁婆、苏吉丹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据《诸蕃志》阁婆国条的记载说，其国“出象牙、犀角、珍珠、龙脑、瑇瑁、檀香、茴香、丁香、豆蔻、荜澄茄、降真香、花簪、番剑、胡椒、槟榔、硫磺、红花、苏木等”[38]中国商人用“金银、金银器皿、川芎、朱砂、绿礬、白礬、硼砂、砒霜、漆器、青白磁器等”与之交易。[39]其中，中国的川芎、朱砂在该国最为畅销，因为当地盛产胡椒，“采椒之人为辛气薰迫，多患头痛，餌川芎可愈。蛮妇擦抹，及妇人染指甲衣帛之属，多用朱砂”。[40]因此，中国商人兴贩，“率以二物为货”。此外，该书还记述了当地人的一些医药风俗，如“荔枝晒干可疗痢疾”，“蔗汁入药，酝酿成酒，盛如椰子”，“多嗜甘蔗、芭蕉，捣蔗入药，酝酿为酒”。[41]

4、三佛齐

此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地产：瑇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荳蔻。[42]由于苏门答腊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故该地云集了来自大食诸国的药物，有乳香、蔷薇水、梔子花、膻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琥珀等。[43]因此，中国商人在其地贸易，不仅购买三佛齐本地的香药，而且还带回了许多大食诸国的药材，反之中国商人带去的乾良薑、大黄、樟脑等药物，在卖给三佛齐的同时，也远销西亚、北非等地。

三佛齐国也多次向宋廷进贡香药。如北宋开宝七年（974），其国贡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褊桃等。太平兴国八年（983），其王遐至遣使蒲押陀罗来贡水晶佛、锦布、象牙、香药。[44]

5、丹眉流

丹眉流国在马来半岛，“地出犀、象、鎗石、紫草、苏木诸药”。[45]北宋咸平四年（1001），国主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贡木香千斤、鎗鑞各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紫草百斤、苏木万斤、象牙六十一株。[46]

6、勃泥

勃泥国在今加里曼丹岛的文莱，《岛夷志略》称其为浔泥，地产降真香、黄蜡、玳瑁、梅花片脑。[47]《宋史》勃泥国条记载当地的医药卫生风俗说：“其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该国于太平兴国二年（977），遣使贡大片龙脑、米龙脑、苍龙脑、龙脑版、玳瑁壳、檀香、象牙等香药。[48]

7、蒲甘

蒲甘在今天的缅甸境内，该国也多次遣使入贡，且带回本国所需之物。如据《南诏野史》记载：“崇宁二年（1103）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卷，药书六十二部。”[49]显然这么多的经典著作和药书的相互传播，对发展两国的宗教哲学、医学、药理学等精神文化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以上史实不难发现隋唐宋元时期与秦汉时期相比，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1）交流的国家、输入香药的种类和数量增多。（2）在药物交流的

基础上，双方还进行方剂、医书以及治疗技术方面的交流。(3) 受中国中医药的影响，在个别国家还出现了本土中医。

三、明清（清前期）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

明清时代，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其时，与中国进行往来交流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安南、占城、暹罗、爪哇、苏门答腊、三佛齐、满刺加、彭亨、柔佛等。和以往朝代一样，这些国家仍然向明清政府朝贡，民间的贸易往来也不绝于途。

1、安南、占城

(1) 明代中国与越南的中医药交流

在海外诸国中，越南是最早向明朝朝贡的国家。[50]根据有关资料，从洪武元年(1368)到崇祯十年(1637)安南进贡79次，贡物有金银、黄金、酒尊、象、马、犀、香料等土特产。[51]而位于今天越南中圻南部的占城国与明朝的关系也很好，双方使节来往频繁，朝贡的次数有72次之多，贡品的种类有茄南香、象牙、檀香、犀角、胡椒等。[52]越南政府在向明朝政府朝贡时，往往提出用土特产品换取他们所缺的东西，像书籍、药材之类。如明天顺元年(1457)六月，越南国王陪臣黎文老奏表云：“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味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明英宗对于越南的请求立即允准。[53]

明成祖平定安南后，在安南的部分府、县设立医学和医学司，[54]推广中医学，并且招纳医药人才到明廷供职。[55]又据史籍所载，明万历六年(1578)二月二十一日，黎世宗莫茂洽“被雷降于宫中，半身不遂”，后来经过医治复免，为了纪念此事，“乃改元，以是年为延成初年”。万历九年(1581)，莫茂洽“被青盲暗眼”，于是，“旁求天下有善医者，治疗数年，疾愈复明”。[56]这表明明代越南的中医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2) 清代（清前期）中越药材贸易

清代中越之间药材贸易非常发达，越南所需药物大部分从中国进口。史籍中对于此事多有记载。如《安南小志》中记载说：“安南之商市皆土人等交互贸易，或柬埔寨及目叶部人为之而已，其通商皆是琐碎小事，其大者常为中国商贾及柴棍府豪商谋占之。国中输出之物产有牛角、水牛角、鹿角、胡椒、橄榄、槟榔、象牙、鳖甲、象骨、水牛角、犀角等等”，其输入之物品是“医药、织布、铁器、茶、陶器、纸、生丝、干果等。”[57]《明清史料》中亦记载道：“商民赴安南贸易，所带货物只有寻常药材及紬缎、布匹、鞋袜、纸张、颜料、灯油、茶叶、白糖、槟榔、烟筒之类，进关带来之货不过砂仁、薯蓣、白铅、竹木等项。”[58]“安南土产微畜，并无中国需用之物，而内地药材、硝磺、绸缎等物系彼处所必需”。[59]又道光九年(1829)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该国(越南)地界毗连广东，向来需用药材等物资之商贾，未能裕如。”[60]

当时，中越药材贸易有海上、陆上两条路。海路是从广东、福建乘船，装载来自厦门、宁波等地(也有一些来自日本)的各种药材出口。[61]应该说这些贸易大多为华人华侨所经营，但也有由葡萄牙人经营从澳门出口的。如据史料记载，在嘉庆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荡州营尤吉（游击）马天盖禀报，白蕉地方有三板一只，内载难夷 14 人，经询问是居住澳门夷人啖哆 等 14 名受雇在西洋夷舡充当水手，在澳门置买药材等物，驾坐啖哆呢等船一共 86 人，载往越南售卖，就近贩有槟榔、苏木等货，回棹驶出，不识土名夷洋，遭风沉溺。[62]

陆路有两条，一是经广西龙州、宁明出镇南关、平而关和水口关，进入越南高平、谅山，贸易地点分别为高平镇的牧马和谅山镇的驱驴；另一条是从云南开化府（今文山县）进入越南。内地赴安南贸易的多是从广西南宁、太平、镇安等府以及广东的韶州、惠州、嘉应州等地的商人，他们或是单身，或是合伙，置货出口。[63]

（3）中越医药书籍的交流

明清时代中越两国医药书籍交流频繁。当时传入越南的医书有明代李挺的《医学入门》、张介宾的《景岳全集》、冯兆张的《锦囊备录》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越南医人根据中医理论编著医书。如越南无名氏著的《新方八陈国语》即取材于《景岳全集》而写成的。明宣德六年（1432）越南人潘学光所撰的《本草植物纂要》，书中大部分是中国出产的药材，表明中国药材大量出口且为越南医生所采用。此外还有《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以及号称“医圣”黎有卓所著的《海上医宗心领全帙》，所述医理多取自《黄帝内经》，药物多采用中药。其他如范百福所写的《仙传痘疹医书》，武手府所撰的《医书抄略》（针灸书），几乎都是受我国医学影响而写成的。[64]而越南人陈元陶的《菊堂遗草》，阮之新所著的《药草新编》等医书，也在明成祖时期中越战后随明军带回中国。

2、暹罗

暹罗即今泰国。根据有关史籍，中国医学大约在 13 世纪中叶速古台王朝时传入泰国，在侨居泰国的华人中，就有通晓医药的。在阿瑜陀耶王朝时（1350 - 1767），都市中就有华侨出售中国药材。[65]史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一书提到，阿瑜陀耶城最受尊敬的医师来自中国，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人。[66]广东省澄海县东里乡旅泰的李松青是有名可考的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的华侨医生，他在曼谷创办李天顺堂药材店，世代相传，成为药业世家。[67]

暹罗在明代时也向中国朝贡，根据《明实录》所作的统计，暹罗从洪武元年（1368）至天启元年（1621）间，共向明朝政府进贡 91 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黄熟香、降真香、罗斛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阿魏、蔷薇水、丁皮、紫梗、藤竭、藤黄、硫磺、没药、乌爹泥、肉豆蔻、荜拔、大枫子、苏木、胡椒等数十种，[68]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香即多达十七万斤。[69]清代，暹罗继续向中国朝贡，贡物有龙涎香、速香、金银香、象牙、胡椒、藤黄、豆蔻、苏木、乌木、大枫子、蔷薇露以及罗斛香等药材。暹罗使者在进贡时，也向中国政府索要所需之人参等药物。如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暹罗入贡，肯赐人参等物，清政府即“诏赐人参”。[70]

此外，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了中国医家的重视，《本草纲目》“烧酒”中记载：“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宝异香，其坛每个以檀香十数斤烧烟熏，令如漆，然后入酒，蜡封，埋土中二三年，绝去烧气，取出用之。有积病，饮一二杯即愈且杀蛊。”李时珍自

述曾亲眼看过这种酒治病的良好疗效。[71]

应该提及的是，在暹罗并不是只有中医存在，而是中、暹、西医并存。泰国民间称中医师为“摩精”，把泰国医生叫作“摩耶泰”，暹语称行医者为“秉慕”。杨文瑛的《暹罗杂记》对暹罗的医药水平和现状有如下记载：“暹罗最通行之医术有中医、西医和暹医三种，西医之悬壶于市者，中、西、暹之人皆有。中暹之医，业斯道者，则判若鸿沟矣！华人不学暹医，暹人亦不习中医”。然而，对于就医者来说，则不同。“华人有疾，求治于暹医者有之，暹人之就中医者亦不少”。[72]

上述关于“华暹医者互不学习”的记载，其实并不尽然，在中医药初传暹罗时或许是如此，但随着中暹两国人员往来的增多，交往的频繁，华侨华人在当地融合的加深，两国的医师也是互相取长补短的。如暹罗的医生使用的药物，中药占百分之三十，他们亦采用中医的望、闻、问、切的诊治方法。反之中国医师也吸收泰国的草药，以丰富草药的品种。[73]该书还记载了中暹医的不同。首先，在治法和剂量上，暹医用药每剂在数斤以上，连服数天，不转方法，汤尽加水再煎再服。其次，在所用品上，暹医不仅使用中医常用的樟脑、冰片、阿魏、丁香、三利、草果、桂皮、苏木、硫磺、川椒、硝石、白礬、刀豆、儿茶、芦荟等药物，而且还使用树干、草根、鱼鸟等骨这些不为中医所使用的药物。第三，在所治疗的病症上，暹医大多“攻泻者多，补益者少”，“其治小儿则以搅蛆为唯一方法”。据书中作者言，经此法治疗“效者少，不效者多”，“曾见搅蛆数日而发热咳嗽如旧，一经中医按症施治，一二剂而见愈者，比比然也”。由此可见，中医要比暹医先进、科学，这也正是中医能够在该地流行、发展的原因所在。

3、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

爪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三佛齐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苏门答腊国地理位置大约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北部。明代这三个国家都向明朝政府朝贡，根据《明实录》所作的统计，从洪武元年（1368）到天启元年（1621）的253年里，爪哇共向明政府进贡66次，贡物主要有：胡椒、荜茇、苏木、黄蜡、乌爹泥、金剛子、乌木、番红土、蔷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膝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龙脑、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芦荟、没药、大枫子、丁皮、番木鳖子、闷虫药、碗石、荜澄茄、乌香、犀角、象牙、黄熟香、安息香等香药；三佛齐7次，贡物主要有乌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脑等；苏门答腊18次，进贡的物品有龙涎、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香、胡椒、苏木、石膏、回回青、硫磺等。[74]

除此以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还体现在双方的民间贸易往来上，根据有关史料，17世纪中国帆船从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口的产品主要有：胡椒、肉豆蔻、丁香、檀香木、牛角、象牙、香料、燕窝及各种药材。其中，胡椒的数量最多，有人统计，从1637年到1644年，每年向中国出口300—1000吨。在中国输往巴达维亚的商品中，人参则占有相当比例。如在1694年到达巴城的22艘（中国21艘，葡萄牙1艘）帆船中，共装有人参61498磅，价值3348银元。[75]

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贸易移民逐渐增多，侨居于印尼的华侨人数也随之增多起来。其中当然包括中医（当地人通常称之为先生，singse），有些中医医术颇为高明。在《开吧历代史记》中记载说，1681年，里耶克罗夫·范·戈恩斯总督因病退休，有一位名叫周美

爷的华人医生，一路护理他回到荷兰。一年后，周美爷返回吧城。之后，凡总督或高级官员有病时，都邀请周美爷给予医治。因此，他得了“吧中第一位神医”的称号。在相关的记载中，还提到在护送总督回国途中，周美爷曾把他的中国式诊断法的知识传授给了总督夫人。[76]这表明中医药在得到印尼人接受的同时，也得到了欧洲人的信任和青睐。同时也说明中华医药不仅传到了印度尼西亚而且还慢慢地向欧洲传播。此外，针灸疗法也很早就传入印度尼西亚，并且在医疗上运用日益广泛。[77]

4、满刺加、彭亨、柔佛、新加坡

满刺加位于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彭亨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柔佛即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根据《明实录》所作的统计，从明洪武元年（1368）到天启元年（1621）间，满刺加共向明政府朝贡 25 次，彭亨 4 次。又据《东西洋考》的记载，明代中国从马六甲（麻六甲）、彭亨、柔佛等国进口的药材有犀角、玳瑁、乳香、片脑、苏合油、没药、沉香、速香、降香、血竭、槟榔等。[78]可见，马来西亚是中国药材的重要供应地。

中国传统医药几乎同时与中国移民传入马来西亚。它不仅受到华人的喜爱和信赖，也受到马来西亚其他种族人民（马来人、印度人）的信赖。因此，在当地有很多华人开的中药店。如 1796 年，原籍广东梅县的华侨万石泉在檳城椰脚街（唐人街）创办马来西亚第一家中药店——仁爱堂。他的后裔敦守先辈创业精神与遗训，使该店经久不衰。[79]在宋旺相撰写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里也提到，莱佛士开埠的头十年（1819 - 1829 年间），新加坡已有几间华人药材店，如开源、成德记、同善、以及福和堂，生意都不错。[80]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医药交流与前一时期相比又呈现不同的特点：首先，明政府人为的加大了中医药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推广力度。其次，明清两代，华侨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不仅使该国信任、接纳中医药，而且使欧洲殖民者也对其青睐有嘉，使之传向欧洲。第三，随着中越交往的频繁，中国的许多医药书籍传到越南，越南的医生对其加以研究和发挥撰写了许多医药书籍，并且传入中国，说明越南的医药人士对中医药学理论已经有了很深的研究。

四、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的影响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医药的交流对于双方都有重要影响。总的来说，是互利互惠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在古代它们一般都处于“病无医药”的状态，即使有本土的医药，也很落后。相反，中医药在古代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医药的传入，给当地人民抵御疾病的侵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先进的医药技术传入东南亚，促进了东南亚各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东南亚各国家社会的进步。

其次，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各国所产药材大量流入中国，一是丰富了中医药宝库。如史籍所载，在五代时，李珣所著《海药本草》，便记有当时中国医学中使用海外香药的事例。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所载 6500 个医方中采用香药的已达数十个。到

了宋代，官修的《开宝本草》共收药物 983 种，比唐代的《新修本草》增加了 100 多种，其中进口药物已达 30 种。北宋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有医方 788 个，其中卷一《治诸风》载医方 89 个，海外香药占 20%。宋代名医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共载医方 68 个，其中 25% 使用了香药。据宋代各种医学著作的记载，以香药作汤剂和成药的，不下二三百种。不少方剂又径以舶上香药命名和配制。如“沉香降气汤”、“顺气木香丸”、“撞气阿魏丸”、“沉香开膈散”、“白豆蔻散”、“木香槟榔丸”、“琥珀膏”、“丁香半夏丸”、“草豆蔻丸”、“肉豆蔻散”、“木香化滞汤”、“大沉香丸”、“硼砂散”、“葫芦巴丸”、“乳香膏”、“琥珀饮”、“琥珀散”等等。二是使我国中医治疗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如没药，有活血、散瘀、消肿、定痛的功能，这给中医疗法开辟了新路；荜澄茄、荜拨，进入了诊治消化系统疾患的行列。官营的医药加工场和剂局，把苏合香油与丁香、沉香、安息香、麝香、白檀香、乳香、荜拨、香附、白术、青木香、鸟犀屑、诃黎勒、朱砂、龙脑配伍组方，制成苏合香丸。《苏沈内翰良方》称，此药曾使一个“奄奄而绝，羸败已甚，手足都冷，鼻息皆绝”的危重病人起死回生。[81]宋宫秘方中，还有用东南亚龙脑与新萝卜汁调合治疗偏头痛的。又有南宋泉州名医李迅所著《集验背疽方》一书，总结当时亲手治癌经验，内中各方所采用舶上香药有木香、沉香、丁香、乳香、麝香、没药等。据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所载，清代从越南新来的药物有丁香油、水安息、胖大海等，并且很快就为我国医人所用，在祝穆的实验方里就记有丁香油治疗瘰疬结核的处方，[82]显而易见，东南亚各国香药广为引进的结果，促使传统的中医药推陈出新，创造性地产生一大批中外药物科学相结合的新药品、新验方，从而丰富了中国中药学和方剂学。

再次，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中医药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还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友好邻邦的世代友谊。

参考文献：

- [1] [汉]刘安. [汉]高诱注：淮南鸿烈传. 卷 18 人间训. [M]. [清]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子部，杂家类. [Z]. 台湾：商务印书馆. 722.
- [2] 韩振华. 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J]. 南洋问题文丛, 1981, (1): 2 - 57.
- [3] [梁]释僧佑. 弘明集. 卷 1 理惑论[M]. 载于 (清)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子部，释道家[Z]. 台湾：商务印书馆. 2.
- [4] 陈荆和. 大越史记全书. 上册，外纪，卷三，土王纪[Z]. 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校和本. 133
- [5] 李经纬、林昭庚. 中国医学通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148.
- [6] 黄国安. 中越关系史简编[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31.
- [7] 黄祥续. 中越历史上的医药交流[J]. 印度支那研究, 1981, (2): 34.
- [8] [宋]范晔. 后汉书：卷 24，马援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846.
- [9] 张承宗. 魏晋南北朝医药与服食养生之风[J]. 苏州大学学报, 1996, (1): 100.
- [10] 黄祥续. 中越历史上的医交流[J]. 印度支那研究, 1981, (2): 34.
- [11] [晋]陈寿. 陈乃乾校. 三国志：卷 49，吴书·士燮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92-1193.
- [12] [晋]陈寿. 陈乃乾校. 三国志：卷 53，薛综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52.
- [13] 李经纬、林昭庚. 中国医学通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224.
- [14] [唐]姚思廉. 梁书：卷 54，诸夷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795、797、794、793.

- [15] 黄祥续. 中越历史上的医药交流[J]. 印度支那研究, 1981, (2): 34.
- [16] [后晋]刘昫. 旧唐书. 卷 19 上, 懿宗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54.
- [17] 陈玉龙. 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 转引自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复印本[M]. 697.
- [18] 史兰华. 中国传统医学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145.
- [19] 黄祥续. 中越历史上的医药交流[J]. 印度支那研究, 1981, (2): 34.
- [20] 史兰华. 中国传统医学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146.
- [21]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M]. [清]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卷 14, 子部, 医家类[Z].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14 - 115.
- [22] [唐]道宣. 续高僧传. 卷 4, 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传[M]. 历代高僧传[Z].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459.
- [23] [后晋]刘昫. 旧唐书. 卷 197, 南蛮西南蛮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273 - 5274.
- [24] 李金明、廖大珂.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87.
- [25] 史兰华. 中国传统医学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204.
- [26] [明]宋濂. 元史. 卷 209, 安南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635.
- [27] 李金明、廖大珂.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180. 黄国安等在《中越关系史简编》中统计为: 从公元 1262 年(蒙古世祖中统三年)起至 1334 年(元元统二年)的 72 年间, 越南陈朝向中国元朝进贡 47 次。其间, 占城国向元朝进贡方物 11 次。
- [28] [明]宋濂. 元史. 卷 209, 安南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635.
- [29] [明]宋濂. 元史. 卷 209, 安南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636.
- [30] [明]宋濂. 元史. 卷 209, 安南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635、4636.
- [31] [宋]周去非著, 杨武泉校注. 岭外代答校注. 卷 5, 财计门[M]. 中华书局, 1999. 195—196.
- [32] 黄祥续. 中越历史上的医药交流[J]. 印度支那研究, 1981, (2): 34.
- [33] 陈荆和. 大越史记全书[Z]. 上册, 本纪, 卷 7, 陈纪, 裕宗十一年条, , 宪宗十一年条. 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校合本. 425、419.
- [34] 潘叔直. 国史遗编[Z]. 下集, 国朝大南记, 绍治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条.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1965)十月初版. 380.
- [35] [宋]赵汝适原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真腊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9.
- [36] [元]汪大渊著, 苏继庠校释. 岛夷志略校释: 真腊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70.
- [37] [元]周达观原著, 夏鼐校注. 真腊风土记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32. 148.
- [38] [宋]赵汝适原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阇婆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55.
- [39] [宋]赵汝适原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阇婆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55.
- [40] [宋]赵汝适原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苏吉丹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61.
- [41] [宋]赵汝适原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苏吉丹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61.
- [42] [宋]赵汝适原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三佛齐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35-36.
- [43] [宋]赵汝适原著, 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 三佛齐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35-36.
- [44] [元]脱脱. 宋史: 卷 489, 三佛齐国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089.
- [45] [元]脱脱. 宋史: 卷 489, 丹眉流国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099.
- [46] [元]脱脱. 宋史: 卷 489, 丹眉流国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099.
- [47] [元]汪大渊著, 苏继庠校释. 岛夷志略校释: 淳泥国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48.
- [48] [元]脱脱. 宋史: 卷 489, 勃泥国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094.
- [49] 陈炎. 中国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J]. 李励图等. 南洋与中国[M]. 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87. 22.
- [50] 赵令扬. 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上册[Z]. 香港: 香港学津出版社, 1976. 13.
- [51] 黄国安. 中越关系史简编[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92.
- [52] 黄国安. 中越关系史简编[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92.
- [5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 明英宗实录. 卷 279[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5969.
- [5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 明太宗实录. 卷 96、106、176、210[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273、1372、1924 - 1926、2131.
- [5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 明太宗实录. 卷 68[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962 - 963.
- [56] 陈荆和. 大越史记全书. 本纪, 卷 17, 黎纪, 世宗毅皇帝条[Z].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校合本. 877、879.
- [57] 姚文栋译. 安南小志[Z]. [清]王锡祺. 小方壶斋舆地丛抄: 第十帙[Z].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75. 168.

- [58] 礼部“为内阁抄出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移会（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广督福通市事宜）[Z].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庚编：第一本[Z]. 精华印书馆铅印，1960.190.
- [59] 礼部“为内阁抄出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移会（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广督福边告藏酌筹善后事宜奏）[Z].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庚编：第二本[Z]. 精华印书馆铅印本，1960.131.
- [60] 军机处录副奏折[Z].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612.
- [61] [英]布赛尔. 东南亚的中国人：卷四，在印度支那的中国人[M].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 (2—3):7.
- [62] 兵部“为内阁抄出两广总督百龄等奏”移会（前次安插内地之越南投首夷人并各起难夷遞回等由）[Z].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庚编：第三本[Z]. 精华印书馆铅印本，1960.132—133.
- [63] “为内阁抄出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移会（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广督福通市事宜）[Z].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庚编：第一本[Z]. 精华印书馆铅印本，1960.187.
- [64] 黄祥续. 中越历史上的医药交流[J]. 印度支那研究，1981, (2):34.
- [65] 李经纬、林昭庚. 中国医学通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667.
- [66] 葛治伦. 1949年以前中泰文化交流[J].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复印版. 513.
- [67] 李经纬、林昭庚. 中国医学通史.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667.
- [68] [明]黄省曾著谢方校注. 西洋朝贡典录：卷中，暹罗国条[M]. 北京：中华书局，1982.61.
- [69] [清]张廷玉. 明史：卷324, 暹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8397.
- [70] 阙名. 暹罗考[M]. 王锡祺. 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十帙[Z].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535 - 536.
- [71]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M]. [清]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73册子部·医家类：卷25，造酿类，烧酒[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505.
- [72] 杨文瑛. 暹罗杂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09.
- [73] 葛治伦. 1949年以前中泰文化交流[J].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复印版. 513.
- [74] [明]黄省曾著，谢方校注. 西洋朝贡典录：卷上，爪哇国条，卷上，三佛齐国条，卷中，苏门答腊国条[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9、35、69.
- [75] [荷]包乐史(L. Blusse)著，庄国土等译. 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112、125.
- [76] [荷]包乐史(L. Blusse)著，庄国土等译. 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235、243.
- [77] 周南京. 历史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J].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复印版. 218.
- [78] 张燮. 东西洋考：卷4，麻六甲、彭亨、柔佛国条[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2 - 43，48，55.
- [79] 李经纬、林昭庚. 中国医学通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667.
- [80] 区如柏. 祖先的行业[M]. 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51.
- [81] 苏沈内翰良方：卷5，苏合香丸条[M]. 孟彭兴. 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J]. 史林.1997,(1):22.
- [82] 黄祥续. 中越历史上的医药交流[J]. 印度支那研究，1981, (2):35.

[责任编辑：廖大珂]

ABSTRACTS IN ENGLISH

Interflow of Buddhist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Sui & Tang Periods

Nie Dening

Abstract: The interflow of Buddhist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periods was more extensive and deeper than during the previous dynastie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features was that the developed overseas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se periods provide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for the interflow of Buddhist culture between two sides. The numerous Chinese monks going to India for learning from Buddhist scripture and their Indian counterparts coming to China for translating Buddhist scripture via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during these periods made up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the highly prosperous Buddhist culture during these periods.

Key words: Sui & Tang Periods; China & Southeast Asia; Interflow of Buddhist Culture

Exch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in Ancient Times

Feng Lijun

Abstract: The exch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 ancient times began from Qin-Han periods and ended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contains four parts, the first three parts of which mainly discuss the mea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m during the three phases of Qin-Han-Wei-Jin, Sui-Tang-Song-Yuan and Ming-Qing Dynasties. The effects of the exch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 ancient times are discussed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China; Southeast Asi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change

Defining the Identities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hinese Businessmen

Zhao Wenliu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ethnic Chinese have gradually got citizen's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their identities have come to be suspected again because of the Indonesian racial disturbance in May 1998.

Key words: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dentity; Chinese businessman